

【一般论文】

跨域与流动：从《新国民日报》论新马文坛 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反响（1919-1925）

**Cross-Border Encounters and Mobility: The Response of the Literary Scene in
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Theory (1919-1925)
Based on *Xin Guomin Ribao***

谢祉毅 许德发*（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

Chia Tze Yi, Khor Teik Huat Sultan Idris Education University, Malaysia
Email: tzeyichia@gmail.com, khor_teik_huat@fbk.upsi.edu.my

Received: 8 Jun 2024; Accepted: 3 August 2024; Published: 15 September 2024

To cite this article (APA): Chia, T. Y., & Khor, T. H. (2024). 跨域与流动：从《新国民日报》论新马文坛对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反响（1919-1925）：Cross-Border Encounters and Mobility: The Response of the Literary Scene in 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May Fourth Literary Theory (1919-1925) Based on *Xin Guomin Ribao*. *ERUDITE: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and Education*, 5(1), 117-138.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6.2024>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37134/erudite.vol5.1.6.2024>

摘要

马华文学的萌芽一直以来都与“五四”文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自五四运动在中国开始展开，马华社会也积极响应。马华文坛通过剪贴、转载中国五四的文字，宣传新思想、新学说，鞭挞旧思想，启迪民智，改良社会，将中国五四的思想传播到马华社会中。在这过程中，报章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新国民日报》致力于推动新文学，促进了新文艺在马华社会的诞生，被誉为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的中心。《新国民日报》中的许多文字除了剪贴与转载五四作家作品外，同时也有出现了本地文人投稿的文艺作品及评论。因此，本文试图通过《新国民日报》中的文学理论篇章，梳理出《新国民日报》中对五四思潮与文学理论的引介与推广，探析新马文坛对五四文学理论的反响。

* 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学程硕士研究生；许德发，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高级讲师。

关键词：马华文坛、《新国民日报》、“五四”新文学、文学理论

Abstract

The budding of Malaysia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lways had an extremel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literary scene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Since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began in China, Malaysia Chinese society has also responded actively. The Malaysia Chinese literary scene disseminated new ideas and theories, criticized old ideologies, enlightened the masses, and sought social reform by clipping and reprinting texts from China's May Fourth Movement. Through this process, newspapers played a crucial role, with the *Xin Guomin Ribao* dedicated to promoting new literature and facilitating the birth of new arts and theory of literature in Malaysia Chinese Literary Scene. In addition other than to clipping and reprinting works by May Fourth writers, many articles in the *Xin Guomin Ribao* also featured literary works and critiques contributed by Malaysia Chinese writ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seeks to analyze the introduction and promotion of May Fourth ideology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Xin Guomin Ribao*, and explore the response of the literary scenes in Malaysia Chinese to May Fourth literary theory.

Keywords: Malaysia Chinese Literary Scene, *Xin Guomin Ribao*, Literary Theory, May Fourth literary

前言

1919年至1925年间马华文坛被视为文学的草创期，此时期的马华文坛因进步文人的缺乏，有许多的文章是通过剪贴与转载而来的，因此学界对于早期马华新文学的文学理论批评之建设并不关注。在现有的研究中，关于此时期马华文坛的文学理论研究资料极少，方修于《马华文学大系》中所收录的关于新文学理论的研究也只有12篇，且部分史料也非完整全文。根据笔者统计，1919年至1925年间在《新国民日报》中针对新文学理论及各种文体发表过意见和讨论的文章便有60余篇。在这些文章中，有的是转介自中国文坛的文章，也有部分文章是在地文人的投稿。这些文章中透露了当时的马华文坛新文学理论的接受与理解。因此，本文将通过《新国民日报》中的文章整理出文学理论，探究早期马华文人的文学观，分析他们对文学功能与价值的论述，从而了解马华文坛草创期的原貌。

1919年5月4日，新文学运动在中国北京展开，并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远在南洋地区的马华文坛也受到冲击，积极参与和响应。在新文学的影响下，马华文坛也迅速参与文学改革的脚步。马华文人开始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发表新思想，改良社会，提倡新文化，灌输侨民爱国思想。时人通过报章，对马华文艺创作提出相关主张，同时也积极创作，形成了一个全新的马华文学论述场域。苗秀认为，早期的马华文艺创作活动，就是以报纸的文艺副刊为骨干的，各个文艺发展时期，都不外以几个大报的文艺副刊为中心，如果说这些报纸的副刊代表了整个马华文坛也不算过分。¹马华文坛的发展就如苗秀所言，仅仅只是依靠当时的几份大报如《叻报》、《新国民日报》、《南洋商报》上的“时评”栏、“来件”栏和其综合性副刊支撑起来。其中最积极参与文学改革运动的当属创刊于1919年10月1日的《新国民日报》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与它们的主编张叔耐。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国民日报》创刊，其副刊《新国民杂志》中的一些版位如“时评栏”、“新闻版”等，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话文章，这就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²方修在其著作《马华新文学简史》中的第一段话便强调《新国民日报》是马华新文学史的发端。《新国民日报》主编张叔耐，积极呼应“五四”热潮，进而使得该报成为华文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基石，是当时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运动的大本营。直到今天，东南亚华文文学界的共识仍然是指这份报纸及其副刊的创刊为南洋地区华文新文学诞生的主要标志性历史

¹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68），页5。

²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1974），页1。

事件。³《新国民日报》刊登了许多关于新文学的理论，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理论的分析，探讨当时马华作家是如何理解新文学的。

一、跨域、流动：《新国民日报》对五四文学理论的接受与响应

《新国民日报》中最早谈论新文学理论的是增恺，于1920年12月16日开始，《新国民杂志》的“新思潮”栏目连载其文章〈新文学目的底商榷〉至1921年1月7日。文章开宗明义地说明了文学的定义与价值。

新文学，新文学！就止文言变成白？了事（是）吗？不是！人家都诌新文学，我们跟着凑热闹吗？也不是！任叔永先生：“今日文学，有不可不革之处。非特文言白话之争而已”本来解答新文学价值的文字已经很大。新文学的真义，乃是平民文学，不是贵族文学，是普通文学，不是部落文学，是写实文学，不是虚伪文学，是创造文学，不是因袭文学。新文学的价值在此！平民文学四字，很易招人误会，现在略加说明。平民文学，固然是对贵族文学而言，但不可以过于拘泥，至陷于形式论或名目论之机。所谓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并不是指一种文学专给贵族看，或专给平民看，也不是专讲贵族生活，或专讲平民生活，更不是平民自己作的文学，或贵族自己作文学，乃由精神上普通与否。真的挚与否，而为别。⁴

文中强调文学的意义“乃是平民文学，不是贵族文学”，这其实与陈独秀于1917年在《新青年》上所发表的〈文学革命论〉论述一致。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一文中的主张新文学革命，必先“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⁵。增恺的这段文字显然受到了陈独秀的影响。

增恺也在文章中进一步说明说明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之区分：

按形式讲，古文仅是贵族文学，白话多是平民文学。古文之作，大抵偏于局部，修饰，游戏，享乐……等，乃成贵族文学。白话总可免却这几道毛病。至于新文学呢？——白话只是新文学底一种工具。——拿真挚，普

³ 李志，〈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马——论南洋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四期（2001），页61。

⁴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0年12月23日）。

⁵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收于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页20。

遍，当作内容骨髓。以普通文体，记述普通的思想事实。比如，我们不记才子佳人底幸福，而述世间普通的男女之离合悲欢，成功失败。我们不谭（谈）英雄豪杰底事迹，只说普通多数的生活情形。才子佳人，英雄豪杰是不常碰到的，而男女多数乃普遍的。我们也是普遍中的一份。平民文学，贵族文学分别也正正在此点，这就是新文学价值的一项。⁶

通过上述文字，不难发现增恺的文学观强烈呼应了“五四”新文学中“平民”的文学价值观。上述文字与周作人 1919 年 1 月于《每周评论》第 5 号上发表的〈平民文学〉一文内容极为相似，更准确地说，增恺将周作人的〈平民文学〉一文挪移至其文章中。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强调文学的“普遍与真挚”，“不必像过去的才子佳人与英雄式创作”，“只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以达到“研究平民生活”，将“平民生活提高”的目的。⁷他在〈新文学的要求〉一文中更倡导文学其实应该是“人性的，是人类的，也是个人的”，而非“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⁸这点同样也被增恺引介到〈新〉一文⁹。由此可见，在此期间的五四新文学的理论虽未在《新国民日报》中刊登，但早已透过不同的形式渗透马华文坛中。当时的文人剪贴、引述中国文坛对五四新文学的讨论，使到五四新文学理论跨域，流动至南洋，滋养着马华文坛。

从形式上来看，增恺将文学分为“纯艺术派”和“人生派”两派，并对两个派别分别进行了定义和解释。不过有别于中国五四主流对于文学现实主义改革社会的激进，增恺认为人生派与艺术派两者各有弊端，但人生派较艺术派强，“然而也有极易呈现的弊病，就是常常讲到功利里边去，拿文艺当作伦理底工具”¹⁰。因此，增恺主张两派结合互补，认为新文学应当走向人生的艺术派，即“以文艺为究极目的，但这文艺当通过了著者底情思和人生互相接触”。增恺以为的人生艺术派文学“就是拿艺术底方法，表现着对于人生的情思，故读前人，能领悟艺术底享乐和人生底解释”。¹¹这显然也是五四新文学中“为人生而艺术”的创作倾向。

⁶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0 年 12 月 23 日）。

⁷ 周作人，〈平民的文学〉，收于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 2 (1918-192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19]），页 103。

⁸ 周作人，〈新文学的要求〉，收于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 2 (1918-1922)》，页 207。

⁹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0 年 12 月 30 日）。

¹⁰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0 年 12 月 28 日）。

¹¹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1 年 1 月 6 日）。

此外，增恺“文学应当立足在科学至上，认为文学乃是“科学上的艺术”。

¹²增恺认为，科学的成立要有下列几条：

- (A) 科学是理智的观察，绝不是显忌那些传说、惯例、历史、习常……
- (B) 科学是有系统，有条理的知识，不是零碎的常识或技术。
- (C) 科学是改造对象的工具
- (D) 科学是精密的实验，审慎的观察，至要科学底精神呢？乃是，用一种极精密的方法，求较真较美较善确实的理。”¹³

文学乃是“科学上的艺术”显然是一种独特的说法。不过回看增恺对于科学的定义不难发现其所说的科学既是现实主义的书写。通过“理智的观察”，结合“有系统，有条理的知识”，以作为“改造对象的工具”，追求“较真较美较善的理”。这样的论述显然与现实主义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处。许多文学史家所指出的，现实主义起初是由十九世纪欧洲一些以描绘“人类真相”为其宗旨的画家所提出，并经由法国小说家杜兰提(Duranty)于1856年出版名为《现实主义》刊物后移植至文学领域。¹⁴大体上，现实主义的文学纲领认为，艺术应当是现实世界的真实再现，而作家则应当通过细致的观察和小心的分析，研究当代的生活与风习，而作者在这一刻应当是冷静、客观和不偏不倚的。¹⁵而增恺的理智观察，以有系统、有条理的知识追求真善美的理（人类真相）显然便是文学现实主义的再现。

如果说增恺的〈新文学目的底商榷〉主要是剪贴引述自中国五四文坛的文章，那么林独步的〈新文学概述〉一文就是马华文人根据自身对五四新文学的理解所编述的新文学理论。林独步的这篇〈新文学概述〉于1922年10月18日至1922年11月25日期间在《新国民杂志》的“评论”一栏连载了40天，共7个主题，约莫1万6千字。这篇文章针对新文学的定义、内容、特质、种类等方面进行书写，涉及层面甚广，篇幅之长，内容之完整，可谓当时马华文坛中讨论新文学理论最完整的文章了。虽然林独步这篇文章对于新文学的介绍非常完整，但却不见于方修所编的《马华文学大系》书系中，因此被许多关注马华文坛的学人所忽略。

¹²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1年1月7日）。

¹³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1年1月7日）。

¹⁴ 戴燕，《文学史的权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页132。

¹⁵ 同上注

在〈新〉一文中，林独步对于文学的解释是：

要之，古代文学之意义，是很不明白，就是今日对文学之定义，亦一人一样，不能完全相同。今取其共通，而不独断的要点调和起来就是“文学是用文字的外形，描写的含有道德意义的“善”和内容的理智的“真”和，感情的艺术的“美”其中以“美”为最重要。而不像科学的偏重知识。不像道德学的偏重训戒，不像游戏偏重快乐。而能给读者美感之一种艺术 Art，就是文字的艺术。谓之为文字的美术亦无不可；所谓文艺就是。”若再分析折之有四要条件：一、文字的外形，二、道德的意义，三、知识的内容，四、感情之内容。¹⁶

林独步认为，文学的内容需要集合道德的“善”，现实的“真”和艺术的“美”，其中“美”最美重要。对于文学的内容，林独步非常看重文学的道德的意义，认为：

道德的意义（在）世间认为的事，没有可以和道德完全分离的；因为道德是维持人类社会安宁之一要件，艺术虽然不可用专制的道德来束缚之，以艺术为道德之方便，使艺术不能充分发展其“美”；但是艺术若不受相当的道德限制，及流于放肆，而失其艺术真正之“美”，甚至祸及人类幸福的根本目的。所以文艺之要有道德的意义，并不是把文艺来做道德之奴隶；正所以维持艺术之“美”，给人类得真正幸福。文艺得了道德之“善”的调和，愈发挥其“美”。道德消极的人除人苦痛，艺术积极增人快乐幸福。¹⁷

在林独步看来，文学必须在道德的约束下才能呈现艺术真正的美，但对于文学中的道德，林独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他反对古代“文以载道的文学”，并极力为孔子辩解，认为在孔子的理解中，文学和道德乃是两个不同的个体，是“一班空挂儒学招牌之人”曲解了文学与道德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学术，不知道受了多大的空言道德的人所牺牲！所以“文学”二字的意义，他们亦是不肯分科，分析的研究；随便注释文字浮次，说“文以

¹⁶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2 年 10 月 26 日）。

¹⁷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2 年 10 月 27 日）。

载道”，而以文也为儒学道德之方便。他们之所以谓“文以载道”，或者误解文字为文学，亦未可知。若以文字与文学为同一物，则岂独文学所以载道！更可谓文学所以记载万有事物了！这样浮泛的解释，真实使我们初学的人脑子痛啊！其写孔子亦是以为道德与文学不同，因为他曾说“德行颜渊闵子骞”来对比“文学子游子夏”；评论其弟子之特长。若是照道学的曲解说“文学所以载道”，那岂不是成为了“道德子游子夏”！岂不是误解孔子之意！此种空言道德之人，真实孔子之罪人！孔子之信用，都给一班空挂儒学招牌之人弄坏！¹⁸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中一个目标是激烈地反对封建思想文化，包括彻底打倒与否定“文以载道”的文学理念。彻底打倒“文以载道”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作家群体的共识与共举。胡适提出文学革命的“八事”主张，第一条便是“言之有物”，这个“物”并非“古人所谓‘文以载道’”，是“五四人”的思想情感、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的“国民”“写实”“社会”的三大主义，明确指出是针对历史上“文以载道”传统的“谬见”、刘半农否定“文以载道”，认为“道是道，文是文。二者万难并作一谈”。¹⁹打倒“文以载道”是“打倒孔家店”的组成部分，是“五四”时期一个革命口号。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们认为中国的问题是思想文化不如人，所以要彻底抛弃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孔孟之道。²⁰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如陈独秀般强调要拯救中国，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打倒孔家店，把旧文化一把火烧个精光地去强烈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五四时期也有部分知识分子采取较温和的方式革命，他们和林独步一样认为儒家思想是被“一班空挂儒学招牌之人”所曲解的。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提出他的全面的文化纲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主张“用科学的研究法去做国故的研究。”郑振铎也认为“古代许多很好的纯文学，也被儒家解释得死板板的无一毫生气。《诗经》里很好的一首抒情诗（《关雎》）……被汉儒一解释便变成‘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了。”“自朱熹作《通鉴纲目》贬曹操，以三国正统予刘而不予曹，于是后之评《三国演义》者，几无一处不以作者为贬曹操，是写曹操的奸恶的。无论曹操的一举一动，都以为奸谋，是恶行。”“为儒者所不道的稗官小说，开卷亦必说了许多大道理。无论书中内容

¹⁸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10月24日）。

¹⁹ 吴周文，《散文文体自觉与审美诉求》，（广东：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页72。

²⁰ 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页151。

如何，而其著书之旨，则必为劝忠劝孝。”²¹在儒学的体系中，所有中国传统文学都成了儒家经典的注释，根本谈不到文学的独立价值。²²因此他们虽支持“打倒孔家店”，但却只是针对传统文化中黑暗部分的指证和批判，比如“吃人的礼教”“奴隶道德”“三纲五常”等，而非全面否定了传统文化。他们带着批判性的态度研究中国的古史和古文献，重估一切传统。林独步显然也受到了这种怀疑主义的态度所影响，在支持新文学发展的同时，也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古史被错误诠释，而非全面的反对与批评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

林独步在其另一文章〈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中对艺术和道德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的解释：

他们以为艺术是道德的奴隶，开口便说“道德，道德”。挂着道德的招牌，好像道德是他们所专包办似的，要表明自己是个很有道德的人。他们那里知道艺术固然不能轻视道德，但是艺术有艺术的独立性，若要句句偏偏都是做人的道德，那剧本小说就成为一种孔夫子讲道德说仁义的无趣味的学究训言了，那里有艺术的价值？那得感动人感化人？这样不如把往昔圣人君子的道德名著，在公众面前宣读，较为快捷，何必再编新剧做新小说呢？²³

林独步认为在文学中，“道德”与“艺术的美”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林独步声明“‘教训’是艺术间接的事，若直接的教训，是道学者，宗教的人物，这就是艺术和宗教道德各不同点中之一不同点”，²⁴并明确强调新文学不能沦为“讲道德说仁义”的“学究训言”，更清楚说明“艺术有艺术的独立性”，不然“哪里有艺术价值？那得感动人感化人”。²⁵

如上所述，林独步在〈新文学概述〉一文中非常注重文学的“美感”及“情趣”：

……我们要知道美感和实际的快感不同，美感的要素不是单纯快感，有时不快感的情亦为美感。像刚才所说过，我们看了悲剧，或哀情小说，其事虽悲惨，却能带一种艺术的美感。况且近代最流行之写实主义文艺，常把

²¹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号（1922年10月）。

²²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1140。

²³ 林独步，〈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4月5日）。

²⁴ 林独步，〈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4月5日）。

²⁵ 林独步，〈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4月5日）。

不快感的人生悲惨黑暗方面，写出来，令人感了一种深刻的印象美感。但是此第三者和发见者所亲受的感情，还不是纯粹的美，此事若经艺术家，把他内容整理删去不必要的部分，用巧妙的文词来点缀成为艺术品；给人鉴赏，或自己观赏，那就是成为纯粹的美感。²⁶

在林独步看来，单纯地将现实生活中的事迹，通过文字记录下来，还未达到美的高度，文学之美必须通过艺术家“把内容整理删去不必要的部分，用巧妙的文词来点缀成为艺术品”。林独步在其另一篇文章中明确地强调了人工美的重要性。他认为生活中的美需“以人工的取舍增减配景。描写之，图绘之，成为人工美的佳景”²⁷，“自然的美”和“人工的美”互相扶助，成为“完全的人生美”给人们无限的，精神的，高尚情趣，美感，安慰，幸福！²⁸

林独步所认为的文学是通过文字的加工和取舍所形成的艺术美，结合了道德的善，内容以书写社会现实的真，积极增人快乐的幸福，带给人类真正的幸福，这些其实便是五四新文学所追求的现实主义书写所相呼应。五四新文学的追求与理论在中国文坛的这个生产地，通过文人的书写和报章的传播，已经跨域流动到了马华文坛。

在五四的背景下，文学的作用与目的被人们无限放大，林独步在文中也清楚地说到：

文学之目的，若简言之：是在表现人生的真相，而给人予实生活以外一种文化的美感幸福。所以描写人生真相之文学，不能离掉现实的“真”，同是于“真”的现实以外，向上求其绝对无限美感的“美”的理想，给读者一面看文艺中所写之事实，一看揣想书中所未写的人生未经念的其余部分——于书中所为写入人生真相中暗示未写人生的全体。不消说的，人生的全体是无限，固然不能明了捉捉着，但是我们一面赏识文艺，一面冷静自己冥想，可以直觉的，心会的，感受一种自悟的真理，心中然说道：“是了！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了！”一掩书，把自己一生所经验之谈复杂食物，回顾之，沉思之，关照之，就是觉了一种微妙的人生情趣。而所想的实物，又觉的都不能满足现在之欲望。于是又发生新生的理想希望，又引出无限的精神活动情趣快感。此就是“人生的乐趣”，此为文艺之最后目

²⁶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11月17日）。

²⁷ 林独步，〈人工美与自然美〉，《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10月19日）。

²⁸ 林独步，〈人工美与自然美〉，《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10月20日）。

的。可谓之绝对的，宗教的情趣，成了一种独特的新宗教新道德。所以文学亦是含有深远的道德意义，而文学之目的可说是在融化“真善美”给人文化的精神快感。²⁹

在林独步的文学观中，文学所呈现的美感不仅仅是一种感官上的快感，而是经过文词的点缀和修饰后所呈现出来的美感。文学借着道德的教训，将“现实人生悲惨黑暗的一面”书写出来，进而达到“表现人生的真相”，给予人们“生活以外的一种文化的美感幸福”。林独步这番对于新文学的解读显然就是“为人生而艺术”在马华文坛的一种宣告。³⁰

实际上，林独步并非首位将文学与人生紧密联系的马华文人。早在 1919 年 12 月 12 日《新国民日报》“时评”栏就刊载了雁声〈“牺牲”与“奋斗”〉一文，其中更是强调了新文化运动的根本属性，便是解决人生根本问题：

新思潮最初的发动，虽是受了某项问题的刺激，实在是一种新文化运动。这种新文化运动是学说上的平民主义，是解决人生根本上问题，依着社会革新的思潮澎湃起来的。在这种思潮进行的程度应该由国民个人自决的性能。在学说上竭力传播关于人生问题的真理和个人或团体的“解放”与“改造”，由小体达到大体。使全国国民觉悟，更进而达到人类觉悟方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的目的。……，因为我知道社会上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根本问题。我们爱国学生也应该从根本上着想，根本解决，在根本上发放。³¹

雁声在文中强调了在新文化运动中解决人生根本问题的重要性，而解决这些涉及到人生重大问题之前提就是需先让人民对目前所处于社会现况有所觉悟。增恺在其〈新文学目的底商榷〉的文章中更直接建议读者参阅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一文。³²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在早期马华文坛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纵观以上史料，不难发现当时的马华文坛热衷于文学创作需迈进人生，而这与当时的中国五四思潮是具有共时性的。实际上，从五四时期，中国文坛中关于

²⁹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2 年 11 月 21 日）。

³⁰ 许德发，〈文学如何“现实”？——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中国现代文学》第 28 期（2015 年 12 月），页 77。

³¹ 雁声，〈“牺牲”与“奋斗”〉，《新国民日报》第 10 版（1919 年 12 月 12 日）。

³²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1 年 1 月 7 日）。

现实主义的论述来看，现实主义的吸引力更大程度上在于西方现实主义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体现在题材上对平民、小人物生活的关注与作家主题态度的严肃真诚。³³ 1918年4月，胡适也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主张新文学作家要注意描写“工厂之男女工人，人力车夫，内地农家，各处大商贩及小店铺，一切痛苦情形”，要求文学创作应致力于“平民化”。³⁴ 这些理论与创作主题也都是马华文坛的重要面向。显然，中国五四文坛的文学理论就如萨义德所说的理论旅行中，从中国这个原点漂洋过海，流入了马华文坛这个新时空中，并成为了马华文坛早期的文学理论建设的重要一环。

二、文类功能的讨论：启蒙意义与对小说戏剧文类的重视

透过上述对早期马华文学理论的分析，可以窥探出早期马华文坛的文学观，既热衷于提倡以表现人生为主的文学创作观。新文学与“人生”所建立起的内在关系，显然已成为了当时马华文坛的主要创作方向。和中国五四新思潮一样，马华文坛对文学的理解同样是作为一种人生关怀及力量而存在的。³⁵ 这一以“人生”为目的的新文学，被赋予沉重的变革与现代化使命，本质上是属于思想革命和启蒙的。³⁶ 新文学的创作肩负着启蒙人民，改革社会的作用。

《新国民日报》创刊时，主编张叔耐在〈例言〉中同样阐明了“杂志一栏大概是以有情趣助兴味为宗旨”³⁷的副刊创办宗旨。《新国民杂志》刊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和转介许多理论的介绍与讨论。张叔耐也在〈例言〉中写下了对《新国民杂志》刊登文学作品期待：

至于这些诗词小品，小说谐文，都不过用以辅助余兴而已。但是也不是胡乱拉着的。第一是不背本报的主义。第二是辅助学问及道德。第三是促进社会的进化。虽则嬉笑寓言，却也含着正经道理，便是衍敷衍于东方，滑稽诙谐的意思。一则因为普通心理，庄言逆耳，科诨动听。一则因为文语

³³ 郑国庆、徐志伟，〈“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郑国庆访谈录〉，《艺术广角》（2011年第3期），页30。

³⁴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³⁵ 许德发，〈文学如何“现实”？——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中国现代文学》第28期（2015年12月），页77。

³⁶ 同上注

³⁷ 痴鸪，〈例言〉，《新国民日报》第2版（1919年10月6日）。

难详，陋词易解。总之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³⁸

张叔耐强调“诗词小品，小说谐文，都不过用以辅助余兴而已。但是也不是胡乱拉着的。第一是不背本报的主义。第二是辅助学问及道德。第三是促进社会的进化。”³⁹说明了副刊《新国民杂志》在提倡趣味的宗旨下，也绝非以游戏人间为目的，而是带有自己明确的立场和社会职责。当时的新马社会亦是一个充斥着大量劳工阶级，文化水准低落的社会。《新国民日报》作为以教育人民，改良社会为目标的报刊，其人清楚知道唯有通过“嬉笑寓言却也含着正经道理”的方式，才能够起到“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的目的，从而加快启迪人民，改良社会的进程。因此，副刊中的文学作品被当时的马华社会赋予重大的期望。

张叔耐在〈例言〉中也进一步阐明其报刊立场及受众对象：

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了，并且也不太合时宜。若还只用些新名词，日日讲平等自由，贪图形式上好看，上等社会的人，是本来懂得的了，不消常常聒噪。而下等社会的人，又理会不来，并且也不是眼前着紧的要务。眼前我们报纸上应当讲的，是极要紧极浅显的话头，因为国家已在实在危险的地位了，所以要讲爱国，将这两个字来唤起民心，故对于下等社会，比上等社会更为注意。因此这些滑稽科浑、浅显的说话，更发少不来，便是本篇用着白话，也就是这个意思了。”⁴⁰

借由上述文字不难发现，为了达到“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的目的，《新国民日报》通过使用浅显的白话文，结合滑稽的方式，吸引来自社会低下阶层的读者，从而达到启迪民智，开风气，拯救国家的目的。这样的论述在“五四”的时代背景下是常见的，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使命。

那么，文学如何起到启民智，开风气，拯救国家的作用呢？李开中在〈文学的责任〉一文中强调：

³⁸ 痴鸪，〈例言〉，《新国民日报》第2版（1919年10月6日）。

³⁹ 痴鸪，〈例言〉，《新国民日报》第2版（1919年10月6日）。

⁴⁰ 痴鸪，〈例言〉，《新国民日报》第2版（1919年10月6日）。

文学是不能脱离环境的，文学是要表现环境改造环境的。……中国现代文学家应当提倡的是感情的冲击的文学，不是理性的玄邃的文学，是血与泪的文学，不是花与□的文学，是灰色惨淡的俄国文学，不是贵族的雍容尔福的英美文学。⁴¹

文中提到文学被赋予改良社会环境的功能，文学家应当以“血与泪的文学”通过“灰色惨淡”的生活题材进行创作，吸引读者的讨论。这种灰色惨淡色彩的题材恰恰也正符合了马华社会作为殖民社会与劳动社会，人民长期生活在压迫与剥削的社会写照。纵观早期的马华文学作品，尤其是 1920 年代初期，大多的作品主题都是对于当下社会情况下对“人”的书写，如对劳工(华工)阶级的艰辛、封建主义下女性的命运、婚姻不自由等等。这些议题显然都属于五四运动所关注的启蒙及解放的显议题。⁴²

关于文学的启蒙与教育作用一直都是五四新思潮的重要讨论，在马华文坛同样有着类似的讨论。早在 1919 年 10 月 25 日《新国民杂志》的“教育研究”栏就刊载了余青心的〈说小说应列入学校教学文课程中及其所教授方法〉一文。文中强烈建议将小说列入学校的课程中进行教学，认为“一个学生不出学校，（想要）知道外面的人情世故，非依赖小说不可，因为小说能够将社会的鬼蜮历历绘出使小说的人如同身历其境意义，自然增了不少经验”⁴³。余青心认为通过阅读小说可以增加学生的社会历练，通过小说中的情节，让读者（学生）经历一遍人生，并在“有个教员去指导他们，关于文墨的处所，就（是）指点他，关于种种有害青年的处所，就说出种种坏处，去提醒他们”，⁴⁴避免学生进入社会后便学坏。林独步在〈新文学概述〉表示，小说“最会把人生一种极小局部的真相详细描写，而暗示读者推想人生全体情趣”⁴⁵，这种将人生写入小说的现实主义模式也成为了当时的马华文坛的创作基调。

《新国民日报》1919 年至 1925 年期间除了大量介绍西方小说外，对于小说书写内容、创作技巧也有许多讨论，如刊登于 1923 年 12 月 28 日的〈小说的使命〉、1923 年 4 月 23 日六逸的〈小说作法〉、1924 年 1 月 25 日的〈小说与人

⁴¹ 李开中，〈文学的责任〉，《新国民杂志》第 14 版（1921 年 8 月 15 日）。

⁴² 许德发，〈文学如何“现实”？——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中国现代文学》第 28 期（2015 年 12 月），页 77。

⁴³ 余青心，〈说小说应列入学校教学文课程中及其所教授方法〉，《新国民杂志》第 14 版（1919 年 10 月 27 日）。

⁴⁴ 余青心，〈说小说应列入学校教学文课程中及其所教授方法〉，《新国民杂志》第 14 版（1919 年 10 月 27 日）。

⁴⁵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 14 版（1922 年 11 月 7 日）。

生)、1924年7月2日的〈小说和感想〉、1924年8月7日丁一投稿的〈小说和背景〉等,其中丁一记录许地山的〈怎样做小说〉一文甚至分别于1923年4月19日和1925年5月21日两次刊登在〈新国民杂志〉中。由此可见当时马华文坛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视。小说本身通俗易懂,且带有娱乐的性质,使之更容易被普通民众所接受。因此,当时的马华文坛致力于推广和培养当地文人进行小说的创作其意图显而易见。

实际上,在有关小说积极作用拥有诸多阐述。自清末起,梁启超便通过小说“寓教于乐”这一角度来阐发小说的积极意义。梁启超曾在《饮冰室自由书》中谈及《经国美谈》和《佳人奇遇记》这两部小说对改变日本国民头脑所发挥的积极效果。而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他又进一步强调“小说”在西方社会的重要作用,即西方这些发达国家的进步,有赖于这些国家普通民众的觉醒,而小说则在唤醒民众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⁴⁶小说的通俗性,它可以满足普通百姓市民的消遣娱乐,同时借小说这种通俗文体,来传达一种政治思想,于潜移默化间变化国民的脑质、气质。在中国五四文坛,鲁迅的批判性小说所引起的关注与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而马华文人以鞭挞旧思想,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为目的的创作思路,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除了小说外,戏曲的教育作用同样也被马华文人所注意。早在1919年11月25日,震瀛在〈近代西洋戏曲之趋势〉一文中便说明了:

近代戏剧学之特色,在乎有社会之意味。故“艺术为艺之故”其价值不仅若此,且在于能描写人生。故文学革命之旨趣,乃在使世人晓然于人生之真义也。……惟今日之艺术,则不然也,其重在写实主义,描写人生寻常事件,其有涉于理想,不足以占优胜也。必如丹麦戏剧家所云,宣讲现代社会最重要之问题,是也,其特色非在其有文学之价值,乃在其能描写正当之人生也。近代戏剧家之著作,纯属提倡社会革命,思想革命,精神革命。⁴⁷

西洋戏曲在当时文人看来是不仅仅只是文学的价值,要能“描写正当之人生”,“使世人晓然于人生之真义”,以在社会改革上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被视为“划除腐败”,“解放青年男女之自由”的方法:

⁴⁶ 张娜,《梁启超人文视阈中的西方“秘索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页520。

⁴⁷ 震瀛,〈近代西洋戏曲之趋势〉,《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19年11月25日)。

近代戏剧家，知今日社会偶像之宜破坏，往昔死亡思想之宜消灭，而世间的糖魅魍魉，须一廓而清之，使新时代的新社会易手产生，使新社会的青年乘时而起，故其价值不仅文学之故也。其溃决社会的藩篱，摧残故人的迷梦，划除腐败的栋梁，其大有助于我辈青年男女之自由解决也。⁴⁸

此外，1922年10月6日开始连载的华桂响〈论戏曲与社会改良〉亦说道：

戏曲所表现人生真相者也，戏曲为文学之一。故以表现人生，惟与小说及其他种文学所不同者，则戏曲乃以动作而表现人生之真相也……戏曲中所表现，不外某人在某地作某事。述其始末，显其因果，然其人必有一定之性行，一定之关系，始能发生一定之动作，表现动作。在使观者发生同情，获得快乐，非如演讲之一意（意义）教训指导。盖剧场非教训之地，乃娱乐之所也。然洗去亦非绝无教训，其教训寓于娱乐之中，使人不知不觉尔迁善去恶。盖戏曲之最要目的，在明人生之真理，善恶之因果，惟直陈其事不加批评使观者自断。故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谓之知之，如观莎士比亚之“凯撒”后，即明凯撒之为人，其性行何著，布卢多之性行何若，其殊凯撒也，宜邪否邪。凯撒当如何而始克免于死，其人之缺点为何，如此评判，教训得矣。⁴⁹

戏曲中所表现出来的“人生之真理，善恶之因果”冲击着观者的心理，改变了观者对社会的观念。范景星在〈改良戏剧说〉的投稿文中便说到“世界有一事最足以感触人民之心理，而能辅助社会者，其唯剧本乎。因其能使人观之而与足以引导人心之趋向，也至于引导社会不良之观念”⁵⁰。由此可见，马华人期望观剧者能够通过新剧中所表现出的情节，改变人们对于社会的不良观点，进而起到改良社会的效果。

1924年下半年《新国民日报》在其副刊《新国民杂志》的基础上再新增了一些文艺性质的姐妹副刊，分别是《小说世界》、《诗歌世界》、《戏剧世界》这三种。苗秀认为（1986）这些副刊是马华文学最先出现的纯文艺副刊，尤其可贵的是这些刊物大都尽量采用当地写作人的稿件。⁵¹在《戏剧世界》的出版宣言中，主编齐民也清楚揭示了戏剧创作与人之关系和文学改革社会的作用：

⁴⁸ 震瀛，〈近代西洋戏曲之趋势〉，《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19年11月26日）。

⁴⁹ 华桂响，〈论戏曲与社会改良〉，《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22年10月7日）。

⁵⁰ 范景星，〈改良戏剧说〉，《新国民杂志》第6版（1920年5月31日）。

⁵¹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页35。

我们站在社会里，无昼无夜，无时无刻，都被虚伪的恶空气包围着，弄得人们大多数鸠形菜色，要死不能，要活不得！可是要把这恶空气冲破，除非多产纯洁的出版物，赤裸裸地逐件来描写，使人们触目惊心，叫他们对穷凶极恶的事，不敢尝试，那才有挽救的地步。……出版物中有转移社会能力的，厥为戏剧。戏剧概分为二种，一是歌剧，一是话剧。歌剧短表情，远事实，演来流于板泄。话剧事实表情，均能体贴入微，演来流于活泼。所以历史上令人崇拜的歌剧大家莎士比亚，反不敌后来居上的一个话剧创造者易卜生。……我们创刊戏剧世界，就是为了这个缘故。虽然大家的作品，比不上易卜生，但是时常赤裸裸地把社会虚伪写出来，指导人们进光明之路去，未必无影响社会现象。⁵²

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文人对于通过出版文学作品，改变臭气熏天的社会之期待，认为戏剧有“转移社会的能力”。马华文人期望通过戏剧的创作和演出，可以揭发出社会上人性发展的虚假面貌，以照亮人们眼前的路，引人们走向光明。

三、理论跨界的不一致：戏剧重于小说

如上所言，五四新文学的理论从中国的生产地跨域流动至马华文坛，且深深地影响着马华文人的文学观。纵观这时期的马华文学创作，几乎与中国文坛一样，大多以当下现实社会的关照，如封建主义下女性的命运、婚姻自由、劳工阶层的艰辛等为题材。文学作为一种人生关怀及力量的中介而存在，在马华文坛同样被赋予了沉重的改革使命。不过，有鉴于马华社会结构与中国的不同，马华文坛所使用的改革载体也有所不同。

1902年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为把小说与维新革命相联系，竭力强调小说的启迪民智的社会功能，使到历来被称为小道的小说从边缘地位向中心地位的移动。⁵³1918年5月鲁迅发表于《新青年》第4卷第5期的《狂人日记》一文推出后，隔年的《孔乙己》和《药》也相继问世，拉开了五四小说的序幕。⁵⁴

《狂人日记》等现代小说以反封建的精神直指人的现代觉醒和国民灵魂改造，又

⁵²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十）·出版史料》（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10。

⁵³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页58。

⁵⁴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页59。

具有特别格式，引人注目。⁵⁵这些小说刊登于《新青年》、《新潮》等现代思想刊物上，让中国现代小说一开始就肩负了沉重的社会使命。⁵⁶五四小说打响了改革的炮火，通过小说宣传改革理念。马华文坛于一开始也深受影响，在小说理论的探讨上做了一番宣传。然而，除了 1919 年刚开始的阶段出现过余青心的〈说小说应列入学校文课程中及其所教授方法〉（1919 年 10 月 25 日）和覃焕征投稿〈對於小學作文教授之意見〉（1919 年 11 月 8 日），后来的三年间也只出现过三篇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分别是 1921 年 9 月才转载了刘半农的〈新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1923 年 12 月 28 日楚芡〈小说的使命〉、1924 年 1 月 25 日剑乎〈小说与人生〉后，直至 1924 年 8 月起才有一定数量关于小说理论的文章。

显然的，马华文坛对于小说理论的讨论并没有如五四文坛般积极。小说理论缺席的这段期间，马华文坛主要由戏剧理论的讨论填补空白。实际上，《新国民日报》非常注重戏剧的价值，除了戏剧理论的讨论外，也常常会刊登新剧上映的新闻于“本坡新闻”版位，且会通过文字介绍剧情内容。⁵⁷此外，《新国民杂志》中也收录了不少关于新戏剧的评论。1919 年至 1923 年间，《新国民日报》收录了许多关于新戏剧的理论评论，例如 1919 年 11 月 27 日的〈危险剧本〉、1920 年 2 月 9 日简恒升投稿的〈剧本与社会之关系〉、1920 年 5 月 31 日范景星投稿的〈改良戏剧说〉、1921 年 3 月 28 日仲贤的〈编剧本之我见〉1922 年 4 月 5 日林独步的〈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和编剧家〉、1922 年 4 月 12 日刘华轼的〈新剧与社会教育之关系〉、1923 年 1 月 6 日楚狂的〈星洲的新剧家〉、1923 年 1 月 18 日璧山的〈星洲的新剧谈〉、1923 年 3 月 3 日伤心投稿的〈戏剧和社会〉、1923 年 3 月 4 日区时投稿的〈我所希望于旧剧员和编剧家〉、1924 年 6 月 6 日 YL 女士的〈旧戏与女权〉等。由此可见，此一时期马华文坛的主要文学理论是建立在新戏剧上，而非小说。

有别于上文所提及《新国民日报》中所转载自中国文坛关于小说的创作技巧类文章，戏剧的评论更多的是由本地文人根据自己的观剧感想，写下对于那时候马华文坛的戏剧剧本、编剧家、演员等方面的想法，并提出了自己对新剧的理解和改良建议，在马华社会引起的讨论与回响比小说来的更大，且大部分文章都针对马华新剧发展问题与建设进行评论，极具马华本土意识。

那么，为什么不是小说而是戏剧呢？

⁵⁵ 同上注

⁵⁶ 同上注

⁵⁷ 如 1919 年 11 月 24 日便有一则关于〈新剧出现〉的新闻出现在《新国民日报》第 6 版的“本坡新闻”中，开篇便强调演剧社会教育之一，并简介了〈就是我〉、〈河伯娶妻〉、〈西门豹〉三部剧的情节和观众反应。

这与早期马来亚的社会结构有关。19 世纪，晚清政府陷入动荡，西方势力的介入，内部的混乱，以至于许多的人民都移居海外。中国沿海一带的居民陆续移居南洋，其中以新马的为主要目的地。推动华人南移有内在因素和外在助力，其中主要有三股力量：一为中国国内形势所逼，二为华人本身的冒险精神及善于应变的求生技能，三为南洋物产丰盛，土地肥沃及环境有利于发展对华人所产生的生产力。⁵⁸颜清湟认为当时的中国人当他们决定出国时，大都怀有挣钱发财强烈愿望。⁵⁹

由此可见，早期的马华社会是一个怀抱着发财梦想，以经济为主的底层社群组成。他们教育水平的低落，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⁶⁰因此，以文字为载体的小说所带来的影响力显然不能比以通过表演、对话和动作来展现故事、情感和人物戏剧来的更大。戏剧活动在马华文坛的出现与政论散文一样早，它比当时一般新文学创作更具有组织性与目的性。当马华文学创作还只是限于个别的活动与自发的状态时，戏剧活动早已经是具有自觉意识，形成一种文艺运动了。⁶¹马华戏剧文学最初的创作动机完全是为了应付“新剧”演出的需要，对剧本的要求殷切，现成的中国创作和翻译作品均不敷应用，于是一些编导人员便动手来创作。⁶²在这样的背景下，戏剧文学的发展比其他文体更具本土意识。不过，早期的作品还相对的粗糙，大都只供剧团本身排演之用，演出结束后即被弃置，直到1923年以后，黄天声、郭乐仙、邱国基、新晓、朱梦非等人的出现，戏剧文学才以比较完整的形式出现于报刊上。⁶³这些创作多半是独幕剧或短剧，内容针砭时弊，注重在改革当时华人社会的一些陋习，如提倡戒烟、戒赌，破除迷信、崇尚西医、反对中药，鼓吹采用新日历，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由等。⁶⁴这些的题材显然是反映着那时候的马华社会的重要议题。时人通过戏剧的呈现，启蒙民众，从而推动社会的改革。

在中国，“五四”时期中国文坛为了适应新文化运动的要求，戏剧运动也以批判为其先导的方式兴起。⁶⁵在中国文坛，文人们也要求将戏剧从两个方面进行革新，从批判中建立新的戏剧观：一是“把戏剧做传播思想，组织社会，改善人

⁵⁸ 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1984），页3。

⁵⁹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页1。

⁶⁰ 崔贵强，〈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84），页119-132。

⁶¹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八）·剧运特辑》（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1。

⁶²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五）·戏剧》（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1。

⁶³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五）·戏剧》，页2。

⁶⁴ 朱绪，《新马话剧活动四十五年》（新加坡：文学书屋，1985），页64。

⁶⁵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页166。

生的工具”；二是提倡现实主义的戏剧，要求戏剧“在当今社会里”取材，表现“我们每日的生活”，描写“平常”的普通人，并打破传统的大团圆注意，如实地揭示现实本来的目的。⁶⁶这些要求是符合五四思想革命和文革的需要的，与同一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提倡也是一致的。⁶⁷

戏剧与小说在五四思想的改革上有着同样的功能，而马华社会有鉴于先天的社会结构问题，识字者少，知识分子更少，像鲁迅这些的小说家更是没有，因此注重戏剧理论的发展也是一种逼不得已的选择。马华社会在一开始便有大量的戏剧社团，自1919起许多的剧团便在马来亚各大城镇，如新加坡、吉隆坡、怡保、芙蓉等地陆续成立。戏剧表演机会众多，不仅普及至一般中小学校，而且还发展到市郊的偏僻地区，使到许多阅读程度不高的少年与村民，在还没接触到新文学作品之前，就已经欣赏到戏剧艺术了。⁶⁸当然旧剧的形式与内容显然未有五四的改革精神，因此可以窥见当时的戏剧有许多的滑稽的内容，也正因为如此，许多有志改革的编剧家便在《新国民日报》上发表了各自对当时剧团演出的看法，并积极提出了改革建议，着重强调剧本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戏剧理论的讨论远比小说来的多的因素之一。

小结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许多新文学理论都从中国文坛这个生产地，跨域流动到马华问题，并且受到了马华作家的大力支持与相应，形成了与五四文坛相似的改革理念。《新国民日报》继承了五四思想启蒙的概念，尤其是对人道主义课题的关注上，更是成为了其重要的文学特征。此时的《新国民日报》肩负启蒙与教化的重任，通过小说和戏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宣传新思想、新学说，鞭挞旧思想，启迪民智，改良社会，亦为马华新文学的主要特质之一。此外，马华文学也因为创作群体和受众群体的知识水平低落，所以更多地通过表演性质的戏剧文学进行改革的推动而非如中国五四文坛般以小说创作进行批判，虽不能说是理论在地的变异，但也是一种因应自身社会需求所产生的变化。无论如何，《新国民日报》对于中国五四新文学理论的引介与推动，丰富了马华文人的视野，使到当时的马华知识阶层对于新文学有了更深层的认识。

⁶⁶ 同上注

⁶⁷ 同上注

⁶⁸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八）·剧运特辑一》，页1。

【征引文献】

一、书目

-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五)·戏剧》(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
-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八)·剧运特辑一》(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
- 方修,《马华文学大系(十)·出版史料》(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
-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1974)
- 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朱绪,《新马话剧活动四十五年》(新加坡:文学书屋,1985)
- 吴周文,《散文文体自觉与审美诉求》(广东: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有限公司,2020)
-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严家炎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二卷(1917-1927)》(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张娜,《梁启超人文学视阈中的西方“秘索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
- 金一南,《为什么是中国》,(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2020)
- 林水椽、骆静山合编,《马来西亚华人史》(八打灵:马来西亚留台同学会联合总会,1984)
- 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印行,1968)
- 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 2 (1918-192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919])
-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颜清湟,《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 戴燕,《文学史的权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二、期刊论文

- 崔贵强,〈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载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84年),页119-132。
- 李志,〈五四新文学“革命”在新马——论南阳地区华文文学中的“文白之争”〉,《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四期(2001年第6期)页43-54。
- 许德发,〈文学如何“现实”?——马华文学现实主义中的政治介面(1919-1930)〉,《中国现代文学》第28期(2015年12月),页71-90。

郑国庆、徐志伟，〈“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郑国庆访谈录〉，《艺术广角》（2011年第3期），页29-33。

三、报章文献

痴鸪，〈例言〉，《新国民日报》第2版（1919年10月1-4，6日）

范景星，〈改良戏剧说〉，《新国民杂志》第6版（1920年5月31日）

华桂响，〈论戏曲与社会改良〉，《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22年10月6-7，9-12日）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第4卷第4号）。

李开中，〈文学的责任〉，《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21年8月15日）

林独步，〈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4月5日-7日）

林独步，〈新文学概论〉，《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10月25日-1922年11月25日）

林独步，〈人工美与自然美〉，《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2年10月19日-20日）

雁声，〈“牺牲”与“奋斗”〉，《新国民日报》第10版（1919年12月12日）

余青心，〈说小说应列入学校教学文课程中及其所教授方法〉，《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19年10月25日，27-30日）

增恺，〈新文学目的底商榷〉，《新国民日报》第14版（1920年12月16-18，20-24，27-29日，1921年1月6-7日）

震瀛，〈近代西洋戏曲之趋势〉，《新国民杂志》第14版（1919年11月25-26日）

郑振铎，〈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文学旬刊》第51号（1922年10月）